

# 专利产权制度是创新文化之翼

日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了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创新改变生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用别人的技术要经过专利所有人许可，还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阻碍创新吗？

其实，追根溯源，知识产权和创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两者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甚至可以说，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创新文化之翼。

当现代专利制度在英国确立之后，迅速被欧洲其他国家效仿，欧洲社会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工业的创新技术和工业资本结合，有力推动了工业革命。

在专利制度下，人们对创新成果

的独占性由法律保障。与此同时，为了申请专利，人们就必须将私有的创新知识披露为公共知识。当专利过期之后，由此形成的公共知识库将极大地提高人们的创新效率。最终，借助知识产权制度，公共知识库存量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会形成良性循环。

因此，在知识产权行业内，对于“李约瑟之谜”有一种解答：专利制度导致近代中国与欧洲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模式上产生巨大分野，进而导致产业革命在欧洲而非中国发生。

回顾专利制度的历史，对今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有重要的启示——通过司法和行政保护，科技创新成果可实现资本化，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可变为真金白银。

正如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宣传词中说的那样：“知识产权制度，

正是通过以下方式支持创新：吸引投资、回馈创造者、鼓励他们开发自己的创意……使未来的创新者可以在当今新技术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随着网络的普及，现在很多人习惯了免费获取资源。其实，“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创新者没有收益，久而久之，创新的源泉就会枯竭，整个社会的创新就会变慢甚至消失。

知识产权制度，简单理解，就是“知识产生价值”的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尊重知识创造的价值，营造尊重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明白了这一点，就能充分理解，为何我国要大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保护知识产权可以直接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经济转型，能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更加美好。

《光明日报》2017.2.16文/袁于飞

在福建泉州这家医院，您每一分钟的志愿服务都是最温暖的投资，将获得丰厚的健康福利——2月11日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开启志愿服务“时间银行”。

## “时间银行”喜与忧

为每一个志愿者发一本志愿服务证，每一次志愿服务都将登记日期、时长、服务内容等信息。志愿者们可以用这些服务时长在福医二院进行健康福利兑换，如优先预约挂号（服务每20小时可享受一次）、体检套餐、享受同等时长的志愿服务等。“时间银行”的出现令人惊喜。

人们做好事，储蓄志愿时间，不仅可以兑换相应的健康福利，遇到困难时，也可以启用自己的“存款”去换取自己所需的服务。此项措施良好初衷和积极意义必须予以肯定。

实际上，这家“时间银行”并非首创，近年来全国各地“道德银行”类似新闻也不乏见，多是开办时热热闹闹，最终效果却难如人意。

“时间银行”的本质就是仿照银行的形式。众所周知，金融银行有一套严格细致的核算体系，“本位币”和“利息”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而好人好事终究属于道德范畴，有的人做了好事不图回报，有的人存在证据、证人不足的情况，有些好事的“量化”标准未必严谨，加之道德资产的投资及管理缺乏精细评估等等，这些都影响了“时间银行”的运营与拓展。兑换对象的局限性也限定了“道德银行”的作用发挥总而言之，将善行具体量化，的确一段程度上可以激励和引导人们“聚小善以行大善”，但道德过于货币化、功利化，也会偏离倡导善德、鼓励善行的方向。

无私奉献、不图回报是传统美德的本质内涵，建设新型道德系统不能依赖于僵化的固有思维，必须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和不竭动力。毕竟传承美德、倡导善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创新思路，不断完善提升，才能避免“时间银行”再次陷入“初时喧嚣，其后了了”的困境。

《中国青年报》2017.2.15文/斯涵涵



当然也有舆论担心，随着偏见渗入程序、运算法则和设计，“男性至上”的趋势可能更加明显。如果现在不改变，人工智能会根据男性最基本的文化准则扩散。例如，让战争机器人形似男性（如许多美国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形似女性（如许多日本机器人）。不过，就目前而言，塔伊事件仍是个案，引诱塔伊学坏的人，难以以主流方式影响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发展。况且，得罪女性顾客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人民日报》2017.2.16文/姜奇平

## 人工智能也有性别属性？

微软公司创造的女性聊天机器人塔伊被放在了社交网络上。微软的本意是希望塔伊通过与人类在社交媒体上的交流变得更擅长沟通，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一些恶意网友诱使塔伊在聊天学习的过程中，变成了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者。眼看机器人一天工夫就被教坏，微软公司只好撤下了塔伊。

人工智能会有性别属性吗？这还真是个问题，甚至一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主线问题。一般认为，左脑（主管逻辑思维、计算）代表男性，右脑（主管形象思维、情感）代表女性。人工智能的早期算法是男性化算法主导。上世纪80年代后，以神经网络为代表的雌性化算法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围棋是少有的需要男性思维与女性思维共同协作的智力活动，围棋局面和层层包裹的牡丹花，在视觉上高

度近似。例如，《红楼梦》里下围棋的多为女性，妙玉、惜春等都是围棋高手。由此，攻克围棋软件人工智能，成了人工智能性别属性之争的高潮。

2016年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的“阿尔法狗”，以及2017年TA的升级版——战胜人类60位围棋高手无一失误的“大师”，都标志着当前算法的一个突破。利用蒙特卡洛算法，将男性化的左脑算法与女性化的右脑算法结合，人工智能向着亦男亦女的方向高速进化。

文中开头提到的塔伊，“她”遇到的问题则是社会性的。过去的一般观点是，互联网包括人工智能的社会性别更加偏向女性，对互联网的女性主义特征的研究也广为流传。女性在網上更喜欢社交、购物，更喜欢感性化的视频，等等。

微信内部规划已久的公众号付费阅读功能，终于要来了。“这个基本功能早就规划了，开放给自媒体自行设计。”2月14日晚，一位腾讯权威人士确认了腾讯将推出微信公众号付费阅读功能的消息。

## 公众号付费阅读是一种知识净化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不管是对原创写手，还是对公众来说。这种功能不仅是知识变现的一种方式，也是对知识的尊重，更是知识价值的体现。这种付费机制将阅读的选择权交给市场，交给大众，让大众根据需求选择阅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优胜劣汰的净化机制。在这种机制作用下，可以屏蔽掉一些低俗的、不良、不实或者毫无价值的信息，从而让公众接受和获得一些有价值、高质量的精华信息。因此，这种付费阅读可以视为是对信息的一种自动净化。有了这种付费功能，公众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掏钱选择适合的信息，选择一些真实的、高质量、有价值的信息。

质量是付费阅读的前提，这就需要在信息提供上做到内容为王。这种付费阅读功能也给信息提供者提了个醒，以前那些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信息可以寿终正寝了。一个内容为王、质量为基的信息供给正在形成，这就需要那些创造者和提供者，多提供一些有价值有品质正能量的信息，这样才能顺应大众阅读需求，适应时代主题。

《北京青年报》2017.2.16文/朱丹

## “富豪低学历”推演不出“读书无用论”

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17社会大学英雄榜”显示，登上胡润百富榜的2000多位资产达20亿及以上的企业家中，有一半人没有全日制本科或研究生学历。胡润表示：“按照社会标准，这些人或许最不可能成功，但他们成功了。通过做这个报告，让我学到了‘英雄不问出处’这句话。”

老实说，上述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半数富豪没有高学历的情形，并不能推演出“读书无用论”，其中关键在于富豪和学历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而从这些富豪的情况看，他们中有许多是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人，如宗庆后、何享健、陈丽华等，目前都70多岁，将近80岁。在他们年轻时，对于学

历的追求，注定是极其艰难的，更多的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而不得不中途辍学。但这并不影响成为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代企业家。

同时，富豪的低学历，也并不代表他们以后对于行业知识、经营管理技能的自觉学习是停顿或一直终止着的。相反，他们往往是做到终身学习的，如报读各类课程，不断充实自我、完善自我，成为行业发展中的翘楚、行家里手，引领自己的企业无往而不胜，业绩骄人。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代企业家的产业经营，多面向制造业、房地产业。他们的平均财富，比有全日制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上榜企业家相差96亿元。而后者恰恰多从事金融投资行业。第一代创

业企业家的成功之道在于人文素质，如诚信、勤奋和务实，而年轻创业者讲得最多的是创新、资源整合，特别是人才和资本，第三是速度，这无疑彰显了知识学历、经营智慧越来越重要性。未来年轻人创业，将离不开高起点的学历。

而就社会对企业家需求而言，我们显然更期待新生代企业家能够向老一代企业家学习，素质上有传承，达到从业道德理念与先进知识的高度融合。

当然，这需要在市场环境、经营秩序、行业监管上狠下一番功夫。确保社会人群创富是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切实充满工匠精神，让每位企业家的血管里“流淌着道德的血”。

《扬子晚报》2017.2.17文/贾志勇

## 隐私得不到保护的大数据无异于炸弹

“大数据时代”、“信息社会”这些词，通常用来描绘现代生活的先进与便利。但在现实中，可能人们首先感到的是威胁。

近日，央视记者向公众展示一项面向所有人开放的“神奇服务”。在网上的个人信息黑市，只需要向贩子提供手机号，就能查询到机主最私密的个人信息，范围覆盖全国。

能查询的信息既包括身份户籍、名下资产、开房记录这些传统项目，还包括手机通话记录、名下支付宝账号、滴滴打车记录、网购收货地址等新兴项目。更令人大开眼界的是，只需要手机

号还能查询到机主的实时定位。凡是你能想到的个人信息，都在信息贩子的业务清单上。

这些比媒体之前曝光的“700元就能买到身份证大轨迹”，还要惊悚，毕竟它还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

被泄露的信息有着精准指向。通话记录对应的是运营商，网购收货地址对应的是电商，网约车打车记录就更不用说了。

未必所有信息都是相关机构的内部人直接泄露出去的，但这些对应的机构必须负起责任，主动清查信息泄露的渠道。退一步讲，即便能站出来撇清嫌疑也是负责任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是，央视记者已经报案，但还没有哪家机构主动出来宣称负责。

时下，技术力量、资本力量和地方政府都在为大数据而兴奋，大家首先做的都是迅速、大规模地收集信息，却忽略了一项原则：不能保护信息，就没有资格收集信息。自己手上的信息是资源，更是责任。

不能保护公民隐私的大数据，就像一颗炸弹，这颗炸弹还是“公用”的。如果我们以最坏的恶意进行揣测，就会发现比电信诈骗更可怕的事情，早已成为可能。

《新京报》2017.2.18文/西坡